

白居易闲适诗与基督教圣诗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ai Juyi's Leisure

Poetry & Christian Hymnology

张思齐 武汉大学

Zhang Siqi Wuhan University

[英文提要]

The life of leisure and comfort, depicted in about a fifth of Bai Juyi's poetry, is a major theme in his works. A third of Bai Juyi's most famous pieces are leisure poetry. The gossamer beauty characteristic of his poems can be traced to deep personal religious sentiments. Bai Juyi's religious thinking is eclectic in nature, combining elements of Buddhism, Taoism, and other traditions. In this essay, these elements are studied in comparison with Christian hymns, which are embodiments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piety. The essay points out how Bai Juyi expresses life's ideals through poetry, and how in a larger sense,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find expression for their religious or inner life through the literary medium.

追求心灵的平静是各种宗教体验的基本特征之一。佛教如此,道教如此,基督教也如此。心灵的平静与闲适的心态之间具有相通之处。闲适是白居易诗歌的主要意境之一。这种意境存在于他的那些诗篇中呢?白居易诗歌的闲适意境,其内涵是什么呢?这是本文欲解答的问题。为了说明它们,我们还需弄明白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白居易的宗教观是什么?白居易的人生理想中是

否具有静心求道的理念?在基督教的圣诗(hymnology)中,有许多作品赞颂信徒灵修生活中个人与主的合一,咏叹基督教修持中的特殊静穆境界。这些圣诗的意境与白居易诗歌中所状摹的闲适心态比较接近。在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视野中顺次探索这四个问题,即构成本文的内容。

一、白居易闲适诗的文献考察

白居易十分勤勉地写作了大量的闲适诗。我们今日阅读这些诗篇,仿佛感受到诗人写作时的巨大快乐。正如《圣经》的诗句所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原文是舌)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①从拉丁原文看,“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描写的正是一种闲适的心态。安居, *requiescet*, 意为休息、宽舒、和缓、静养。具有宗教修养的人,其心态基本上就是在希望中求得闲适。所谓心态,也就是灵魂所处的状态。心灵快乐,便会通过舌头,发为歌声,这就成了闲适诗。“我的灵快乐”在拉丁文中作“我的舌头欢跃”(*exultavit lingua mea*)。从文献的角度看,白居易的闲适诗共含三类:闲适类、言闲诗和咏闲诗。岳麓书社《白居易集》(长沙,1992)以《四部丛刊》影印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白氏长庆集》为底本,据多种典籍补录拾遗,既完备又便于寻觅。以下即据此书以搜检。

第一类为闲适诗。此名称由白居易自己所拟。白居易亲自编订的《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是诗文合集,他将其中的诗分为七

^① David enim dicit in eum. Providebam Dominum coram me semper, quoniam a dextris meis est ne commovear. Propter hoc laetatum est cor meum et exultavit lingua mea, insuper et caro mea requiescet in spe. —Act 2, 25 – 26.

类:讽喻、闲适、感伤、律诗、杂体、格诗和歌行。闲适类编为四卷:闲适一,古调诗,凡 53 首,见原集卷五;闲适二,古调诗五言,凡 48 首,见卷六;闲适三,古调诗五言,凡 58 首,见卷七;闲适四,古调诗五言,凡 57 首,见卷八。以上共计 216 首。

第二类为言闲诗。此名称由笔者所拟。指其他各类诗中,标题本身就直言“闲”的作品。这类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白居易编订集子时,采用的分类标准不一致所造成的。在他所分的七类诗中,前三类以内容相从,后四类却以体裁归类,故后四类诗中亦有许多本来应当归入闲适类的作品。重要作品分布如下。卷一三律诗中有《和郑方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城东闲游》、《长安闲居》、《晚秋闲居》。卷一五律诗中有《晏坐闲吟》。卷一六律诗中有《官舍闲题》、《闲游》、《闲吟》、《湖上闲望》。卷一七律诗中有《闲意》、《春江闲步赠张山人》。卷一八律诗中有《东亭闲望》。卷一九律诗中有《闲坐》。卷二〇律诗中有《闲夜咏怀因召周协律刘薛二秀才》。卷五二格诗杂体中有《闲夕》。卷五三律诗中有《早春西湖闲游怅然兴怀忆与微之同赏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镜湖之游恐未暇偶成十八韵寄微之》、《闲卧》、《临池闲卧》、《闲出觅春戏赠诸郎官》、《城东闲行因题尉迟司业水阁》。卷五四律诗中有《登阊门闲望》、《正月三日闲行》、《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卷五五律诗中有《初到洛下闲游》、《初授秘监并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闲行》、《闲出》(兀兀出门何所去)、《闲出》(身外无羈束)、《和裴相公傍水闲行绝句》、《北窗闲坐》。卷五七律诗中有《咏闲》、《勉闲游》。卷五八律诗中有《闲吟二首》、《闲忙》。卷六二格诗中有《冬日早起闲咏》。卷六三格诗中有《饱食闲坐》、《闲居自题》、《闲吟》、《秋凉闲卧》。卷六四律诗中有《池上闲咏》、《把酒思闲事二首》、《池上闲咏二首》、《营闲事》、《拜表回闲游》。卷六五律诗中有《闲卧有所思二首》、《喜闲》、《闲卧》、《初夏闲吟兼

呈韦宾客》、《晓上天津桥闲望偶逢卢郎中张员外携酒同倾》、《洛阳堰闲行》、《闲园独赏》。卷六六律诗中有《闲居春天》、《洛下闲居寄山南令狐相公》、《闲游即事》、《幽居早秋闲咏》。卷六七律诗中有《闲吟寄皇甫郎中亲家翁》、《闲适》、《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久雨闲闷对酒偶吟》、《与梦得沽酒闲吟且约后期》。卷六八律诗中有《杨六尚书频寄新诗诗中多有思闲相就之意因书鄙意报而谕之》、《闲乐》。卷六九半格诗中有《闲坐看书贻诸少年》、《对酒闲吟赠同老者》、《晓起闲行》、《春池闲泛》、《闲居自题戏招宿客》。卷七一律诗中有《闲坐》、《闲眠》、《闲居贫活》、《闲居》。另《补遗一》中有《池畔闲坐兼呈侍中》、《闲游》(欲笑随情酒逐身)。

以上共计 77 首言闲诗。闲适诗与言闲诗两者相加共得 295 首。白居易现存诗近三千首。直接描写闲适之作占总量的十分之一。

第三类为咏闲诗,名称由笔者所拟,指其他实际内容赋咏闲适的诗篇。这部分作品数量极大,大约也占总量的十分之一。名篇主要有《逍遥咏》,见卷一一感伤;《无可奈何》见卷二二铭赞箴谣偈;《知足吟》,见卷五二格诗杂体;《急乐世辞》,见卷五十三律诗;《自咏》,见卷五四律诗;《对镜》,见卷五七律诗;《自问》,见卷五八律诗;《落齿辞》,见卷六一铭志赞序祭文记辞传;《览镜喜老》,见卷六三格诗;《少年问》、《少年答》,见卷六五律诗;《自戏三绝句》,见卷六八律诗;《香山居士写真诗》,见卷六九半格诗。三类总计,闲适诗占白居易诗歌创作总量的五分之一强。如果从内容性质分类计算,闲适诗为白居易诗歌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类,远远超过代表其现实主义倾向的讽喻诗和新乐府二者的总和。

闲适诗在白居易诗中的地位如何呢?闲适诗如此之多,它们是否代表着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主流和作品中的精华呢?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前,须以辩证的态度对白居易的闲适诗加以审视。我

们今日言主流,指的是事物的本质特征所显示出来的主导方向。白居易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他在文学史上之地位主要是靠讽喻类诗歌奠定的。对这一类诗歌他自己有较为完整的理论表述,主要见于《与元九书》、《新乐府序》、《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伤唐衢》以及《策林》、《策问》中的部分文章,而以《与元九书》之表述最为集中。因而可以认为讽喻诗是白居易自觉的创造,也是其诗歌的主流。至于精华,还得从作品的艺术构成上着眼,看其是否创造了新的意象,语句是否警策,是否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就人类精神活动的一般规律而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必须有一个悉心加工、仔细打磨的过程,诗歌更是这样。诗人须有相当的闲暇,方能对其诗作进行反复的修改和提炼。在对诗作进行艺术加工的同时,心态的闲适也是必须的。诚如英国文史大家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所指出:“一切智力活动的进步均产生于闲适。”^①虽然白居易诗的精华较多地体现在其讽喻诗中,但是也散见于其他类别的作品之中。例如,白居易诗的第一佳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系《赋得古原草送别》的首二联,白居易自编《白氏长庆集》的时候,将它置于卷十三律诗类,并没有将它归入讽喻诗之中,而此诗显然是精华。又如,成书于北宋初期的著名大型诗文选本《文苑英华》也选有白居易的部分闲适诗。比如,卷二四五《和郑方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同高侍郎下隔年及第》,卷二五八《洛下闲居寄山南令狐相公》,卷三四九《无可奈何歌》。在选家们看来,这些作品显然是精华。当然,闲适诗多即事咏怀,有直抒胸臆、直呈心态的优长之处,也存在着仅仅以韵语纪事的倾向,其中精华的比重不是很大,这也是必须看到的。

^① All intellectual improvement arises from leisure.—Boswell, *Life of Johnson* (L. F. Powell's revision of G. B. Hill's edition), vol. ii, p. 219, 13 Apr. 1773.

二、白居易闲适诗的意境内涵

闲适诗一体虽非白居易首创,却是他大力开拓的诗歌境界。白居易闲适诗的内涵是什么呢?须结合历史加以考察,方能揭示之。《新唐书·白居易传》:“赞曰: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他文未能称是也。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序言:‘关关美刺者,谓之讽喻;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他为杂律。’又讥‘世人所爱,为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喻,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新唐书》卷119)赞,古代史书中的总评性文字。《新唐书》的赞,多为欧阳修亲自撰写或审定。这一段赞以文章大家、著名诗人的眼光评价著名诗人,自然稳妥中的。而且此赞本身使用白居易自己的话为内容,可谓知言。一个人,究竟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他人所论究竟有些隔膜。人们一般将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区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律诗、杂体、格诗和歌行七类,这里简化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民间所喜欢的是白居易的杂律。这些作品,别人看得重,他自己却看得轻。这“一重一轻”实际上又重新对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诗歌作了二分法:一是力作,一是杂律。据上一节的数量分析,闲适诗占白居易诗歌总量的五分之一强。如果按照力作和杂律进行再分配,则闲适诗大约占白居易力作的三分之一。从作品的卷数上看是这样。从重要性上看,白居易本人将其闲适诗列于第二位。这说明,他认为闲适诗的重要性仅次于讽喻诗,而比感伤诗意义重大。白居易对闲适诗的定义包含两点。一、“咏性情者,谓之闲适。”二、“闲适,思澹而辞迂。”前一句话指明了闲适诗的描写范围。后一句话指明了闲适诗的文体特征。这种特征即“思澹而辞迂”,它与“意激而言质”呈

二元对立状态,而后者是讽喻诗的文体特征。至于感伤诗的文体特征,他没有加以界定。这就说明,白居易着意经营的其实只有讽喻诗和闲适诗两类。

以上是白居易用命题的形式对闲适诗作的界说。他还用诗歌体裁对闲适下过定义。白居易有一首诗,标题就叫做《闲适》:

禄俸优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风光暖助游行处,雨雪寒共饮宴时。
肥马轻裘还粗有,粗歌薄酒亦相随。微躬所要今皆有,只是蹉跎得较迟。(《白居易集》卷67)

游行处,一本作游人处,以游行为胜。还粗有,一本作还且有,以且有为胜。此诗系律诗,以对仗的原则观之,孰优孰劣,自明。

意境的闲适,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美呢?在我看来,作为意境的闲适是一种朦胧美。理由如下。所谓意境,既要有意,又要有境。意比较虚,容后申说。境比较实,亦值得辨析。境界的本质与绘画有联系,诗歌的意境离不开一幅幅的画面。要理解白居易的境界,得看他写了些什么。居、吟、望、题、游、意、步、坐、夕、出、行、独、忙、咏、事、园、闷、饮、乐、放、泛、眠……其中有的属于行为,有的属于事物。在白居易看来,一切行为均可等闲视之,一切事物均可等闲观之,一切心态均可等闲处之。白居易不爱管别人的闲事,却喜欢经营自己的闲事。白居易《营闲事》诗:

自笑营闲事,从朝到日斜。浇畦引泉脉,扫径避兰芽。
暖变墙衣色,晴催木笔花。桃根知酒渴,晚送一瓯茶。
(《白居易集》卷64)

既然对于一切的事物,都以闲心来看待,则对这些事物的观照所得,必是不甚精细,不甚计较。这样的得到的美感必然是一种恍恍惚惚的美。不过恍恍惚惚的美,未必不能及于事物的本质。所谓恍恍惚惚,见出真美大美。所谓恍恍惚惚,赏其真美大美。简言之,闲适的心境容易感受朦胧美。

至于意,内涵极为丰富。白居易的闲事诗所咏叹的实际上是一种朦胧的情调。情调上的朦胧在白居易的词中表显得更明显一些。白居易的名篇《花非花》是一篇介于诗和词之间的作品,可以辅助说明其诗的朦胧美。白居易诗的朦胧美就是一种情调。请看:“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全唐诗》卷 890)过去解此作品,人们喜欢把它坐实,说是作者爱上了某官妓。一说官妓上应女宿星,女宿也叫婺女,便词是双关语,借雾为婺。还说此词作于乐天出任杭州刺史以后与卸任苏州刺史以前。考据对于认识词作的本事有用,对于欣赏词作的意境则未必有益。《花非花》词的美学价值在于,它说明了白居易有创造朦胧美的本领。女宿,或婺女,在营造朦胧美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它是二十八宿中北方玄武七宿之一,主水,暗示了水灵灵的女性美,于是在朦胧的道教意蕴中将该词的情调烘托了出来。《圣经》也有用雾来烘托朦胧美的例子,比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①通过比较我们看出《花非花》词与乐天大多数闲适之作一样,具有叫人乐天知命、在有限的人生中及时行乐的大众的宗教意识。雾,拉丁原文用的是水汽(vapor),正好与白居易《花非花》词暗含的道意相吻合。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量极大,随便的韵语纪事之作较多,因而其诗是比较质实的。不过他偶尔也有

^① Qui ignoratis quid erit crastinum, quae enim est vita vestra. Vapor est ad modicum patrens, deinceps exterminatur. —Vulgata, lac 4, 14.

以朦胧美见长的诗篇,比如:

烟霞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

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霄中。(《全唐诗》卷462)

更为充分地表现白居易朦胧美的闲适诗是《游悟真寺诗》。此诗五言一百三十韵,计一千三百字,载《白居易集》卷六闲适三。该诗语言质朴,明白如话,所谓“用语流便”。(许学夷《诗源辨体》)这种遣词造句的方式本来是很难产生朦胧美的。但是白居易才大,具有“用常得奇”(刘熙载《艺概·诗概》)的本领,他烘托出了一个朦胧的世界。这是一个幻化的世界,“闻名不可道,处所非人寰!”(《全唐诗》卷429)在白居易的诗中,那种看似实,实际上却相当虚,由虚及幻,由幻产生朦胧感的作品极多。从根本上说,正是由于这些作品中存在着宗教意识,才产生了朦胧美。

白居易的诗,尽管语言浅切,却与现代诗的朦胧不同。新诗中的朦胧之作,只有少数写得比较成功,大部分是不成功的。朦胧的新诗叫你读不懂,那是睁着眼睛的朦胧。乐天诗的朦胧,叫你一读就懂,闭上眼睛,回忆阅读的感觉,方始觉其中的朦胧。仿佛大白话,其实味无穷,比如粗茶淡饭,一辈子也吃不伤胃的。这种特色古人称之为遣:“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以讽喻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叙事制诏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文苑英华》卷653)这个“遣”,意即排遣。白居易才大思富,多诗多歌,他要放歌一通才舒服。我们读白居易的闲适诗,要多读之后才能够见其朦胧美。浅尝辄止,就会误以为白居易的诗只是一味质实。

三、白居易的宗教观

白居易是宗教情结浓郁的诗人。已有学者对白居易的宗教观作过研究,通过具体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其中的道教因素。詹石窗《道教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二编“随唐五代北宋的道教文学”,第四章“中晚唐的文人诗与道歌”,第一节“香山居士戒求仙与述道意”,论之甚详。这里再作进一步探索。笔者认为,白居易的宗教观是儒教、佛教和道教杂糅的,并非只有道教情结一种。而且在白居易的宗教观中,佛教成分所占的比重远比儒教和道教成分大得多。理由如次。

首先,在白居易的诗篇中言佛的作品远远比言道的作品多得多。白居易言道的作品只有十篇左右。它们是《海漫漫》、《梦仙》、《读老子》、《读庄子》(庄生齐物同归一)、《隐几》、《读庄子》(去国辞家谪异方)、《宿简寂观》、《寻李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寻王道士药堂因有题赠》、《酬李炼师见招》、《早服云母散》、《送毛仙翁》、《玉真张观主下小女观阿容》等。至于《霓裳羽衣歌》和《怅恨歌》,笔者认为只是借道教的事物以烘托氛围,具有道意,但不是以道教为主题。白居易言及佛教的作品则极多。其中不少诗篇可以从标题直接见出其言佛。单是题赠佛门中友人的诗作就有大约二十首。白居易《神照禅师同宿》诗:

人年二月晦,山梨花满枝。龙门水西寺,夜与远公期。
宴坐自相对,密语谁能知?前后际断处,一念不生时。
(《文苑英华》卷217)

这位神照禅师与白居易之间能够用“密语”交谈,颇值得注意。

密语,一指甚深难解的佛教用语,一指密宗的陀罗尼。《密藏记本》:“密语者,凡夫二乘不能知,故曰密语。真言者,如来言真实无虚妄,故曰真言。”从白居易的性格看,他自幼聪慧过人,成年后襟怀宏放,著作多多益善,交往多多益善。白居易是完全有可能喜欢上密宗那一套神秘主义的玩意儿的。从根本上说,密宗之所以秘传,其实是为了教给人们一种生存的智慧:不要声张,一切都应悄悄地进行。性格要闲适,心气要平和。这就是智慧。试比较《圣经·箴言》:“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她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她的道是安乐,她的路全是平安。/她与持守她的作生命树,持定她的俱各有福。”^①平安,拉丁文原文作 *pacifica*,这个词具有爱好和平、息事宁人、温和平静、性喜和解等含义,用来状摹白居易的性格正好合适。白居易的一生,虽然也遭到过贬斥,但他基本上是生活得有条不紊的。白居易是有福之人。就其生存智慧来说,白居易很早就把握住了生存之妙道,他知道怎样尽可能地保持一种闲适的心态。下面是白居易直接言及佛教而艺术上又比较高超的诗篇的初步统计:《郡斋月下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以来出处之意》、《对小坛寄远上人》、《与僧智如夜话》、《寄山僧》、《晚春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送文畅上人东游》、《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兰田杨六主簿因呈智禅师》、《赠草堂宗密上人》、《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朗蒲晦三上人》、《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萧相公宅与智远禅师有感而赠》、《山下留别佛光和尚》、《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

^① *Beatus homo qui invenit sapientiam et qui affluit prudentia. Melior est adquisitio eius negotiatione argenti et auro primo fructus eius. Pretiosior est cunctis opibus et omnia quae desiderantur huic non valent comparari. Longitudo dierum in dextera eius in sinistra illius divitiae et gloria. Viae eius viae pulchrae et omnes semitae illius pacificae. Lignum vitae est his qui adprehenderint eam et qui tenuerit eam beatus.*—Vulgata, Prv 3, 13—18.

赠之诏上人居安国寺红楼院以供奉》、《赠别宣上人》和《秋游平泉赠常处士闲禅师》。以上十五首诗载《文苑英华》卷二二一释门类，属于直接描写佛教的作品。另外，《文苑英华》卷二四五酬和类中，也有佳作。比如《酬梦得以予五月长斋言僧徒绝宾友见戏十韵》，也是直言佛事之作。同书卷二三七寺院类中有《题虎丘寺六韵》、《送王十八归山寄题山游寺》、《孤山寺遇雨》、《旅泊景空寺幽上人院》、《宿灵岩寺上院》等诗，则间接言及佛教。显然，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看，其宗教观中佛教的成分多于道教成分。

其次，白居易对佛教的净土宗有特殊的兴趣。在唐代，净土宗特别兴盛。就其原因，大概因为净土宗的教义相对简单，修持易于实行，便于广大民众掌握，它也就掌握了广大民众。本来一度兴盛的唐朝，经历过安史之乱(755—763)后，到了白居易(772—846)的时代，已经盛景不再了。净土宗认为，只要信众不断念念有词，口称“阿弥陀佛”，就可以进入西方极乐净土(sukhavati, happiness; sukha, happy; -vati, -ness)。净土的含义就是中国民众向往的福国。白居易性格随和，他能够做到老幼合三班。虽然居于高位，知识通达，并非一般的愚夫愚妇，白居易也喜欢净土。大概他不喜欢那些思辨性太强的宗教教义。白居易有两篇文章直接谈到净土，即《画弥勒上生帧赞》和《画西方帧赞》，俱载《白居易集》卷七一。两篇文章都有长序，表达了白居易对净土宗的理解。至于白居易直接写到净土宗的诗，今人陈扬炯、冯巧英《昙鸾集评注》引有一首：

余年七十一，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
何以度心眼，一句阿弥陀。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
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日暮而途远，吾生已蹉跎。
旦夕清静心，但念阿弥陀。达人应笑我，多却阿弥陀。

达又作么生，不达又如何？普劝法界众，但念阿弥陀。^①

此诗是典型的白居易风格，七次重复“阿弥陀”一词，显出回环往复的美，具有敦煌通俗歌辞的风味。白居易信仰佛教净土宗。他还与一些同好组织结社“九老会”。九老会是信仰净土宗的九位老人的结社，他们各赋诗纪事，还请人作了画像，写上会员的姓名和年龄等，为一时文坛盛事。白居易《九老图诗序》：“会昌五年三月，胡、吉、刘、郑、卢、张等六贤，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尚齿之会。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二老，谓洛中遗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归洛僧如满，年九十五。”诗曰：

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暮双归。

当时一鹤犹希有，何况今逢两令威。（《全唐诗》卷462）

复次，白居易号香山居士，而不以某某“道人”或某某“仙”为号，足见其思想中好佛的成分多于好道。既作居士，白居易是虔心理佛的。他写过一首《在家出家》诗，是对其居士身份的最好的说明。

衣食支吾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

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中霄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全唐诗》卷458）

^① 陈扬炯、冯巧英，《昙鸾集评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67页。

这首诗描写白居易作晚间默祷的情形,其虔诚与进入状态之貌,真是宛然可掬。白居易一心一意理佛,他忘却了一切。白居易的心浸透在宗教的境界之中,宛如一介僧侣,女儿也好,妻子也好,无论如何呼唤,他都不予搭理了。世间的烦恼,此时统统烟消云散,他的灵魂得到了安息。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比宗教更能安慰人心呢?在基督教圣诗中,有一首歌,不妨与白居易此诗进行比较。歌中写道:

走近病人走近垂亡, / 既然来了不白忙。 / 答一句话
治愈创伤, / 抚慰痛者呼上苍。 / 遇见耶稣我们唱, / 求坐
仁慈座位上。

困倦病痛还有垂亡, / 兄弟姊妹齐帮忙。 / 依靠他们
及时帮忙, / 别人负担我分享。 / 一切贡献都献上, / 求坐
仁慈座位上。

每个孩子充满希望, / 伸张双手心里想。 / 仁爱律令
天地充藏, / 永远给人以希望。 / 丰盛贡献都献上, / 求坐仁
慈座位上。

病人罪人不幸人人, / 崇拜治疗美德能。 / 直到不幸
变成高兴, / 救赎治疗又洁净。 / 与你永远合为一, / 审判桌
前得宽悯。^①

这一首圣诗系用苏尔塞斯(W. Schulthes)创作的安魂曲(requiem)的调子谱写而成,调式为 8787 - 77。此调式的含义是:每一诗节由六行组成,前四行述意,由八音步句和七音步句交替构成;最后两行作小结,为两个七音步句。其内容本身也是一首安魂曲。

^① Hymn 368 written by G. Thring, Hymns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Willian Clowes and Sons, Limited, 1924, p. 301.

歌词的作者是赛令(G. Thring)。西方人创作圣诗,有两种办法处理音乐性问题。一是用古调和著名的现成调子,这大致相当于填词。一是用现代调子,这大致相当于创作新诗。不论古今中外,人都是需要慰藉的。在西方,此诗在医院里播放或低吟浅唱,用来宽慰垂危的病人。当然,此诗也可以在教堂里演唱。演唱圣诗的时候,往往根据歌词的内容,选择一段《圣经》的经文加以朗诵,相当于创作联章体词的时候,配上念语一样。这一首圣诗所配的经文如下:“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只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太 8:16)白居易因为性格喜欢闲适,而创作了闲适诗,又因为信仰佛教,便为其闲适诗找到了一个永恒的中心理念。白居易爱好闲适,毫无疑问具有从宗教中寻求慰藉的倾向。

四、白居易的人生理想

总的说来,白居易的人生理想未离儒家传统的范式。白居易的人生理想中是否具有静心求道德一面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尽管在白居易的诗中有专门言道和言佛的作品,我们仍然不能认为,白居易的一生基本上受到佛教思想支配或道教思想的支配。白居易的基本形象,并不是一个静心求道的道家,也不是一个一心念佛的释门弟子。他是一个进取心很强而又有节制的知足者,其基本思想倾向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他所求的道是儒家的正道。白居易是中国封建社会极盛时期典型的乐观开朗的文人。这是理解白居易全部著作的关键,也是理解其闲适诗的钥匙。

把握白居易的人生理想,主要应当看他对待名位的态度。这种态度间接地反映在他为崔玄亮作的一篇墓志铭序中。

由于孔夫子的教导,每一个士人都想在有限的人生中演出有

声有色的活剧来,白居易也不例外。白居易的最大特点是其一生做到了善始善终。纵观他的一生,虽然也有过波折,但是基本上生活丰裕,以高官致仕,享寿七十有六。白居易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对名位的清醒认识分不开。白居易集中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并序》,铭仅二十四字,序长一千五百字。崔公,指白居易的好朋友崔玄亮(768—833),因避玄宗讳,又作元亮,字晦叔,排行十八。郡望博陵安平(今属河北),生于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德宗贞元十一年(795)登进士第。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解褐补秘书省较书郎。历任监察御史、驾部员外郎、洛阳令、湖州刺史等职。文宗太和四年,由太常少卿迁谏议大夫,旋拜右散骑常侍,官终虢州刺史。玄亮所存诗文无多,《全唐文》存其短文两则,《全唐诗》存其诗两首。我们对玄亮的了解只有凭两《唐书》本传、白居易的这篇文章和若干交往诗。两《唐书》本传均约三百五十字,太简略,白居易这篇文章便成了玄亮最好的传记资料了。

太和五年(831),宰相宋申锡由宦官构陷入狱,玄亮曾率谏官十四人苦诤,文宗终于感悟。崔玄亮立了大功,由此名重于朝。七年(833),他以身体不好为由,请求外任,宰相认为弘农便其所请,就授予他检校左散骑常侍的衔,实际任虢州刺史之职,这是类似于宋代差遣制的做法。关于此事,白居易写道:“未几,朝有大狱,人心惴骇,势连中外,众以为冤。百辟在庭,无敢言者。公独进及雷,危言触麟,天威赧然,连叱不去。遂置笏伏陛,极言是非,血泪盈襟,词竟不屈。上意稍悟,容而听之,卒使醉疑唯轻,实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旌忠臣。由是正气直声,震耀朝右,缙绅者贺,皆曰:‘国有人焉,国有人焉!’公以为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决就长告,径遵归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公济源有天,洛下有宅,劝海弟子,招邀宾朋,以山水琴酒自娱,有终焉之志。无

何,又出虢州刺史。盖执政者惜其去,将欲驯致而复用之。大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于虢州廨舍。”(《全唐文》卷 679)崔玄亮品质高洁之处是他关于“名不可以多取,退不必待年”的认识。唐代有退休制度,称为致仕。崔玄亮认为,一个官员不必硬要拖到规定年龄才退休,做出了业绩之后,稍微提早一些退休,反而更体面些。这比那些改填假年龄、赖着不退休之辈清高多了。为人作传记,书与不书,如何书,有赖于传记作者的史识。在凸现传主的性格特征的同时,往往也体现出传记作者本人的性格特征。因此,当传主与传记作家的遭遇或人生体悟大致相同的时候,传记往往感人至深,具有揭示人物灵魂层面的力量。白居易写作《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并序》,颇得史家笔法,因而文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白居易择要而书,重点凸现了崔玄亮对待名位的态度,论及其遭遇时笔端凝结着激荡的感情。可以说,白居易在描写崔玄亮对名位的态度时,之所以那么投入,那么动情,那么传神,是因为他在写作时仿佛来了一个置换,将自己与玄亮换了位,故而能够设身处地道出心中的隐情。其间的道理,正如辛弃疾《贺新郎》词所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其实,白居易笔下的崔玄亮,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他自己。崔玄亮的人生态度建立在“名不可以多取”的信条之上。白居易本人也十分欣赏这一点。白居易《感兴二首》:

1.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
不闻风浪覆虚舟。
名为公器勿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难不食,
大都食足宜早休。
2. 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岂触罗?热处先争炙手
去,悔时岂奈噬脐何?

尊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我有一言君记取,
世间自取苦自多。(《全唐诗》卷455)

第一首诗,直接道出“名为公器勿多取”。第二首诗,用鱼、鸟、猩猩和燕子的遭遇为比喻,说明过分追求名位必然遭到的危害。鱼儿长着一身锦鳞,它不要别人羡慕,知道深深地潜入水底,它是聪明的。小鸟长着美丽的羽毛,它不让人们夸赞,知道飞往高高的天上,它是聪明的。猩猩和燕子贪图名誉,它们是愚蠢的。一个因其血色鲜美被宰杀,因为有人喜欢取其猩红的颜色。一个翩翩翻飞,依恋美丽柔软的帘幕,于是结巢在帘幕上,因而一朝覆巢灭亡。俗话说,人生短暂,如鸟儿宿于林。既然如此,就应该无忧无虑,快活如鸟儿,而不应该有“机心”,盘算这盘算那,尤其不应过多地着意于名位。基督教圣诗中有一首《小雀鸟大雀鸟》,歌词唱道:

小雀鸟,大雀鸟,你在树上甚安逸,/往上飞,往下飞,
主必保佑你。/我比雀鸟高贵多,天父更要看顾我,/赞美
主,赞美主,我是他儿女。

小绵羊,大绵羊,你在山上甚安逸,/或吃草,或喝水,
都是主预备。/我比绵羊高贵多,天父更要看顾我,/赞美
主,赞美主,我是他儿女。^①

这首圣歌歌颂鸟儿和绵羊的自由自在,它们不为名位发愁,与白居易诗句“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岂触罗”正好吻合。不过由于圣歌《小雀鸟大雀鸟》神学的意蕴更为浓厚,立意也更高一些,显得十分清纯。此圣歌在中外广为传唱,调子是一首常见的西方

^① 中国基督教协会,《赞美短歌新编》,1996,第460首。

民歌小调:蜜梭梭,法啦啦,蜜梭梭嘻多来咪。今日英国街头艺人弹唱此曲调的不少,青年们也喜欢跺着脚,一缩一进,按此曲调跳舞。至于歌的立意,来源于《圣经》中的一段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必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防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①这一段话在《圣经》中两次出现,即太 6:25—29,路 12:22—27,文字大致相同。至于这样的思想,则在《圣经》中频繁地出现。标准修订版英文《圣经》(RSV)未就此加小标题,不过行文中有一句:“Do not be anxious about your life.”新标准修订版英文《圣经》(NRSV)加有小标题,作“不要忧虑”,英文作 Do Not Worry。行文中作“Do not worry about your life.”英文新国际版《圣经》(ENIV)的小标题与行文与新标准修订版相同。回过头来看白居易,他字乐天。乐天,显然来自《易经·系词上》:“乐天知命,故不忧。”理雅各(James Legges, 1815—1897)在翻译《易经》的时候,把这一句话处理为:He rejoices in Heaven and knows its ordinations; and hence he has no anxieties. 仔细寻绎《易经》此语之含义,再对比《圣经》“不要忧虑”的含义,可以知道“乐天”就是“不要忧虑”。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可以说:to adopt a do - not - worry attitude, 我们也可以说:to adopt an attitude anxious about nothing. 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人们有一句口头禅“万事无忧事事祷。”(Do not worry about anything, do pray for everything.)在中国,《易经》后来被道教崇奉为

^① Matthew 6: 25 - 29.

根本的经典之一,其宗教色彩是不言而喻的。《易经》又是联系儒家和道家的桥梁。从古至今,有人肯定儒教的存在,也有人否定儒教的存在。这里不拟对此进行论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儒学至少是一种具有准宗教意识的文化体系。因此,儒家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情结。在论及人生困惑的时候,往往是这样;在论及天命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这种宗教情结,未必消极,它教导人们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处理现实问题,并且有助于人们在纷繁的现实矛盾中不失心中的理想。

以上的研究说明,白居易和崔玄亮二人的相知相遇是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的。然而就同时代的诗人进行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另一个问题,白居易的闲适诗篇的创作远远多于同时代的别的诗人。在与白居易密切交往的文人集团中,其他诸位如刘禹锡、元稹、崔玄亮、九老会中诸人等,都没有写过那么多的闲适诗。这就说明,白居易的闲适诗不仅是诗人思想的产物,也是诗人特殊的性格的产物。

五、白居易的性格

白居易《与元九书》：“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是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迫穷，理固然也。”（《全唐文》卷675）这一段话道出了白居易闲适思想的总的根源。由此出发，可以追寻白居易的性格。在这里，白居易言及“造物者”，这值得我们充分地予以注意。这是因为，言及“造物者”、“造物主”、“造物”、“受造”等概念最多的就是基督教了。在基督教圣诗中，关于安贫乐道、坦然对待名位的诗篇是非常丰富的。例如《别恋慕世俗的荣华》（拙译）：

世俗的荣华你不必留恋经营，/看敬畏中每一颗头颅
低倾低倾。/基督，万王之王，我们的上帝，/由天使的大
军簇拥着来临。/长翅膀的小天使大睁着眼睛，/六翼天
使个个把眉毛遮紧，/说什么公侯伯子男掌握权柄，/都在
那里呼喊着哈利路亚，/声如雷霆。

你看他走近前来勇作牺牲，/因为需要帮助的是芸芸
众生。/他来了，他来做人民的食品，/用自己的身子让他
们的灵魂欢欣。/长翅膀的小天使大睁着眼睛，/六翼天
使个个把眉毛遮紧，/说什么公侯伯子男掌握权柄，/都在
那里呼喊着哈利路亚，/声如雷霆。^①

这首圣诗的标题揭示了主题，别恋慕世俗的荣华，当然也包括名利、名声、地位、财富等等虚幻的东西。诗中所用的意象“小天使”、“六翼天使”以及衬词“哈利路亚”等都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然而，“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毕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命题。这句话的出处究竟在哪里呢？后来被崇奉为道教理论祖师的庄子，喜欢谈天说地，此命题正好是由他所提出的。《庄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觐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货之圃。”（《庄子》天运）庄子提出的这个命题，使得白居易终生以闲适之心安身立命。通览《庄子·天运》全篇，我们发现，在庄子那里，人、命运、名位、财产等观念都是在天这一最高的大范畴中进行思考的。

那么，天究竟是什么呢？庄子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庄子为战国时宋人，他生活的时代距离殷商不远。庄子的天的观念其实

^① Hymn 717 translated by A. J. Mason from the Greek, Hymns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Willian Clowes and Sons, Limited, 1924, p. 622.

就是殷商时期的上帝观念。在甲骨文中,天字多种写法,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天,从口从大。口,象人之头顶。大,象正面人形。这是一个会意字,本意指人的头顶。后来,这个字代用为天地之天,则为借音字。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从口从大之天用为天地之天的例子。不过,从后代关于天的认识,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出商人对于天的看法。其观念大体从三个方面有所表现。一、在甲骨文中,天另有一种写法,从上从大,大为正面人形,会天在人上之意。甲骨文中的这种写法才是后代天字的最初形态。天字的这种构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比较的契合点。试比较《圣经》:“马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①考拉丁原文,如果直译出来,这句话应作:“于是马利亚说,我的主在一切有气息之物之上变大了。”*Magnificat*,动词:变为大。*anima*,夺格:于一切有气息之物之上。那么,是谁变为大呢?指 *mea Dominum*,我的主,即上帝。有趣的是,拉丁原文的语词排列也正好是从上从大。二、甲骨文雨字的早期写法,为一横下面六个雨点。上面的一横即天之表示。试比较《圣经》:“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②如果把这句话直译出来,应作:如虹形状,雨天云中,如斯光辉,每每回旋。众所周知,在《圣经》中,“光”是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它表示上帝的意志。在下雨天(*in die pluviae*),有彩虹出现,有云朵漂浮,有光辉环绕,控制这一切的是谁呢?按照基督教的理解,正是茫茫浩宇中的上帝。三、从卜辞来看,帝在商人的心目中是居于一切之上的主宰者,所以也称为上帝。有时简称为上,如卜辞中习见的上下之上即指上帝。试比较《圣经》:“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

① *Et ait Maria, 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Vulgata, Lc 1,46.*

② *Velut aspectum arcus cum fuerit in nube in die pluviae. Hic erat aspectus splendoris per gyrum. —Vulgata, Ez 1,28.*

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与亚伯兰!”^①如果把这句话直译出来,应作:他向他祝福说,亚伯兰被赐福,由崇高的神,他创造了天和地。拉丁文用 *Deus excelsus*, 崇高的神。英文新国际版《圣经》(ENIV)用 *God the Most High*, 最高的上帝。由此可见,天字所从之上、雨字所从之一、和上帝的简称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含义是相近的。换句话说,商人心目中的天和上帝是相近的,甚至是同一的。卜辞中不用天字来表示天地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别的字起到了表示天的作用。商人关于天的这种观念,不仅为道教所继承,儒家也接受了过来。请看《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里所说的命,显然指天命。

所谓闲者,乃佛、道修行而心旷神怡之境界,通儒适度而处世有方之神态。白居易洞达佛、道之境,而又以通儒之识贯穿之,因而他能够做到乐天知命,一生优游不迫。我们不妨比较几位著名文人的性格。白居易,身心安处为吾土(净土)。苏轼,大抵心安即是家。他们两人,性格颇接近,从流传的肖像画来看,两人的身体都长得胖胖的,腰带都结束得松松的,他们追求自乐。欧阳修,优游不迫,凡事知足,但是当他在个人名誉受到侵害的时候,也曾经愤怒过,曾数次愤而辞官,自求外贬,他追求自适。从流传的肖像画来看,欧阳修长得比较清瘦。辛弃疾,一生中几度赋闲,他报国无门。不过辛弃疾仍然能够做到身赋闲而志不失,他专心于制作词章,在长短句里找到了寄托,他自得其乐。韩愈,具有急切的功名心,性情急躁。据他自己说,还不到五十岁便两眼昏花、白发苍苍、齿牙动摇。对于其生命的本体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损失。韩愈的一生,过分地追求现世的成就,真有些自食其苦果的意味。幸好在他做了吏部侍郎之后,于长庆四年(824)八月请了一百天病假,

^① *Benedixit ei et ait, Benedictus Abram Deo excelso qui creavit caelum et terram. —Vulgata, Gn 14, 19.*

才享了享清福,留下了《南溪始泛三首》等诗篇。我们这才得以了解,韩文公偶尔也有心情闲适的情形。

然而在文学史上,却普遍流行着一种说法:白居易自贬江州(815)之后,一变早年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味独善其身,知足保和,诗风随之迥异,以往那种干预政治的尖锐笔锋,全部收敛起来了,吟咏所及,不越个人生活境况及情绪,和与朋友交流情感的酬唱,以及山川胜迹的观游,云云。笔者认为,白居易爱好闲适,固然有其思想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性格天生如此,并不是政治上遭受挫折的结果。白居易生性爱好闲适,其宗教观又巩固了他的这种性情上的倾向。这可以由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实际来予以说明。白居易的闲适诗,诗风前后基本一致。其中第一首为《长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吕二、吕四颖、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方,时为校书郎》。此诗作于贞元十九年(803),因为诗题本身就说明了写作的时间。那时候,白居易还是一个翩翩少年郎,意气风发,很想为朝廷干一番宏伟的事业。但是他已经在写作闲适诗了。十二年之后,白居易才贬谪江州。怎么能说白居易是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才开始写作闲适诗呢?考人们对白居易诗的认识,有两个间接的来源。一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此书完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后经逐步扩充,初版于1950年。该书的重点放在讽喻诗及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三首长篇诗作上。陈寅恪是一位真学者,当然无意迎合什么时代潮流。第二个来源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这一段时期的研究,由于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特别注重那些具有“人民性”的作品。由于这种有明显倾向性的研究恰好与真正的大学者陈寅恪的研究相吻合,于是人们对白居易的了解便被框定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之中:白居易是具有人民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诗人。这样一来,九世纪的中国诗

人便戴上了一顶十九世纪欧洲作家的高帽子,煞是好看,却不相称。后来,阶级斗争的理论得到不恰当的强调,人们便顺着这种理论,勾勒出了白居易诗风变化的曲线。其实白居易本人,只想做他那个时代的健全的人,他的诗风比较平稳。闲适诗的创作贯穿在白居易的一生中,反映了白居易的宗教观,也是白居易诗风的稳定剂。